



兼诸子众家思想，助帝王修身治国。

大学生传世经典 随身读

吕氏春秋

(精选本)

○ 李运富 刘波 选注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兼诸子众家思想，助帝王修身治国。

大学生传世经典 随身读

吕氏春秋

(精选本)

○ 李运富 刘波 选注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吕氏春秋：精选本 / 吕不韦著；李运富，刘波选注。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
(大学生传世经典随身读)

ISBN 978 - 7 - 04 - 024483 - 0

I. 吕… II. ①吕… ②李… ③刘… III. ①杂家
②吕氏春秋 - 青年读物 IV. B229.2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5134 号

策划编辑 何明星 刘金菊
封面设计 张 楠
责任校对 殷 然

责任编辑 赵愫简
版式设计 王凌波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 - 58581118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 - 810 - 0598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机	010 - 58581000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raco.com.cn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787 × 960 1/32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4.625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0 000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4483 - 00

大学生传世经典随身读

编写委员会

主编 李建国 李佐丰 马振方

编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蔡英杰 陈 莉 崔枢华 董志翘

方向东 顾国瑞 郭芹纳 贺友龄

李建国 李运富 李佐丰 刘 利

马振方 孙雍长 禹克坤 张 猛

张明高 朱承平

前　　言

春秋战国时代，统治天下的周王室及周代的礼乐制度对诸侯国的约束力越来越弱，诸侯国各自为政，“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①，相互攻伐兼并，征战不休。同时，伴随着贵族阶层的衰落，士阶层渐渐兴起。面对政局的混乱与人民的困苦，很多有智识的士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方案，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主张恢复周代的礼制，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道家倡导无为，法家注重法与术，名家提倡“正名实”。士人们在各国间四处游说，希求自己的主张得到君主们的采纳。有的士人进而著书立说，可称为中华文化“元典”的经典著作大都在这一时期逐步成形。

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混战，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中国的政治版图呈现出统一的趋势。战国中后期，秦、楚、魏等国任用商鞅、吴起、李悝（kuī）等人主持变法，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根本性的变化。经由变法强大起来的秦国最强盛，在战国七雄中首屈一指，拥有了重新统一天下的实力。与此同时，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整合、统

^①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

一的趋势，于是在强大的秦国诞生了一部囊括各家学说、整合各种思潮的著作——《吕氏春秋》。这部书由秦国权相吕不韦组织编纂，历来被视为杂家的代表著作。

一、吕不韦其人

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史记》《战国策》中记载了吕不韦的生平事迹，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战国纵横家书》也载有与他相关的内容。我们对吕不韦生平的了解主要来自这些文献。

吕不韦是濮阳或阳翟（dí）人，阳翟即今河南禹州。家庭从事商业，“往来贩贱卖贵”，在各国之间做倒买倒卖的生意。“家累千金”，非常富有。

吕不韦继承家业，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且还很有政治头脑。他在赵国的首都邯郸做生意时，认识了秦国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妻妾众多，他把最宠爱的一个立作正夫人，称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异人是夏姬的儿子，不得宠，因此被送到赵国做人质。当时秦赵之间多次发生战争，赵国自然不会礼遇异人，他的日子过得很窘迫。

吕不韦见到异人，觉得他“奇货可居”，于是问父亲：“耕田获得的收益最多几倍？”父亲回答：“最多十倍。”“贩卖珠宝赚的钱最多几倍？”“最多百倍。”“那么拥立一个君主安定一个国家能赢利多少呢？”“那就无数了。”所以吕不韦做了决定：要去帮助异人得到秦国的君位。异人动了心，对吕不韦许诺：如果自己做了秦王，要“分秦国”与吕不韦“共之”。

吕不韦把所有家财押在异人身上，让异人肆意挥霍、广交宾客。他自己前往秦国，游说华阳夫人，称赞异人的贤能智慧和孝心，说华阳夫人一旦“色衰”，安国君不再宠爱她，她又没有儿子，就危险了。因此，华阳夫人把异人收为自己的养子，改名子楚。这样，子楚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安国君的嫡长继承人。

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秦国进攻赵国，赵国打算杀死子楚。子楚在吕不韦和众宾客的帮助下逃到秦军中，得以回到秦国。又过了六年，秦昭王去世。安国君继位，他就是秦孝文王。子楚成为秦国太子。这时候，赵国把子楚的妻子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一年以后，孝文王去世。太子子楚继位，他就是庄襄王。庄襄王践行许诺，任命吕不韦做丞相，封为文信侯，把洛阳十万户赏给他做食邑。又过了三年，庄襄王去世，太子嬴政继位做秦王。嬴政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他为“尚父”。吕不韦的权力更大，财富也更多，家中的僮仆超过万人。吕不韦达到了他政治投机的目的。

吕不韦担任丞相之后，就“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吕不韦带兵灭掉东周，周王朝正式结束。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国分别在庄襄王元年、庄襄王二年（前248年）、秦王政三年（前244年）多次发动对韩、赵、魏三国的战争，获得不少城池和土地，新建了三川郡、太原郡、东郡。又在庄襄王三年（前247年）和秦王政六年（前241年）分别瓦解了东方六国的最后两次合纵。吕不韦还利用东方各国的矛盾，分别与燕、韩两国连横，对东方各国形成了分割包围的局势，这对以后的统一战争

是很有利的。总之，吕不韦执政的十三年，秦国的国力变得更加强盛。

吕不韦与庄襄王之间的亲密关系埋下了他最终死于非命的种子。据《史记》记载，庄襄王还在邯郸做人质时，吕不韦挑选了一名美貌善舞的女子，在让她怀孕之后献给庄襄王。该女子生了孩子之后，庄襄王就把她立作夫人。那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秦王嬴政^①。秦王政继位时年龄很小，太后尚且年轻，常与吕不韦私通。吕不韦眼看秦王政渐渐长大，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招来祸害，就给太后推荐了一个叫嫪毐（lào ài）的人。太后非常宠爱嫪毐，让他进宫做了个假宦官，与他生了两个孩子，还封他做长信侯，国家政事“皆决于嫪毐”。

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秦王政亲自主政。有人向他告密，称嫪毐不是真宦官，而且与太后生了两个儿子，并与太后谋划在秦王政死后让他的儿子继位。秦王政于是处死嫪毐，夷灭他的整个家族，杀死他和太后生的两个儿子。这件事牵连到吕不韦。第二年，秦王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职位，命令他回到河南洛阳的封地。吕不韦从此一蹶不振。很多学者认为，吕不韦被秦王政贬黜，根本原因不是真假难辨的宫闱秘闻，而是刚刚成年的雄主与久掌大权的权相之间的矛盾。

吕不韦被削除官职之后，各诸侯争相聘用吕不韦。据《战国策》记载，吕不韦曾去赵国，做了短时间的“守相”，因为秦国进攻赵国，不得已离开赵国。秦王政担心吕不韦会引发事端，下诏把他和他的家族迁移

^① 《史记》的这些记载并不一定可靠，梁玉绳、钱穆、郭沫若等学者都有辩证。

到蜀地（今四川）。吕不韦知道自己免不了被杀的命运，于是服毒自尽。他的门客上千人把他葬在北邙山下（在今河南偃师）。

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评论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孔子所称的“闻”，《论语·颜渊》解释说：“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色取仁而行违”，意思是表面上仁义，实际行为却相违背。裴骃《史记集解》引马融的话说：“此言佞人也。”他们对吕不韦的品行评价都不高。

总体上说，吕不韦是战国末年一位有智略、有胆识、善于机巧权谋、擅长笼络人心的政治人物。

二、《吕氏春秋》的成书

要谈《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我们必须先了解当时的养士风气。春秋战国时期，贵族阶层日渐衰微，旧有的世禄制度解体。为了应对新的局势变化，各诸侯国不得不依靠士阶层的力量来维持或改善统治，士阶层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渐提升。一方面，贵族们很难全面熟悉内政、外交以及自己封地等方面繁杂的具体事务，不得不依赖士人的辅助；另一方面，士人中的许多人没有固定产业，只能投靠权臣贵族，依靠他们获得衣食和仕宦的机会。这样就形成了贵族养士的风气。

战国时期的权臣贵族，大都养着一批门客或舍人，也就是具有一定知识或某种技能的士人。有的大贵族门客过千。门客数量众多时，也会形成一定的组织，甚至有等级之分，比如孟尝君的门客就分传舍、幸舍、代舍，每舍设有舍长，每个门客都分别属于上中下不同的等级，饮食车马等待遇也有所差别。战国时期养

士最有名的四位贵族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吕不韦觉得，秦国国力比东方六国强盛，这方面也不能落后，所以他大量招致士人，给予很优厚的待遇。他的门客达到三千人。

战国时期，各学派的代表人物收徒讲学，著书立说，他们的著作在各国间流传。《史记》记载，吕不韦受这种风气的影响，“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史记》的简要记载留给我们很多信息，也留下不少谜团：

一是《吕氏春秋》的作者。《史记》认为是吕不韦让他的门客们每人写下自己的想法，然后“集论”而成的。这就是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门客们撰写的。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著录为“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这个“智略士”指的就是吕不韦的门客群体，他们具体是谁已经很难考证了。《史记》记载，甘罗、李斯、司空马等人曾经做过吕不韦的门客，他们都有可能参加了撰写或编辑工作，不过，现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实。

二是吕不韦在编纂《吕氏春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史记》所称的“集论”、《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辑”都表示：吕不韦是这部书的主持者、编辑整理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吕不韦是《吕氏春秋》的主编。不过，历代学者对《吕氏春秋》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吕不韦的思想这个问题的看法分歧很严重：有的认为吕不韦只是编纂组织者，对全书的内容和思想没有直接的贡献；有的认为《吕氏春秋》有明确的宗旨，各部分之间基本是协调的，表达了吕不韦的思想

体系。我们觉得，《吕氏春秋》既然确定无疑是由吕不韦主编，那么承担编写任务的门客们虽然秉承了不同学派的思想，但也不至于提出与吕不韦的主张背道而驰的观点；此外，吕不韦也大可在编辑过程中将不合己意的文字黜落删削。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说：“二家（指《吕氏春秋》与《淮南鸿烈》）固以裁定之权，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尝不约于一律，斯又出于宾客之所不与也。”因此，认为《吕氏春秋》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吕不韦的思想，应是比较可信的。

三是《吕氏春秋》的编辑成书过程。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似乎《吕氏春秋》是一次性编成的。不过，很多学者根据其他材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吕氏春秋》包括纪、览、论三部分，另有《序意》一篇，放置在纪之后。但是先秦著述的惯例，序都放在全书的最后，因此《吕氏春秋》可能是分两次编纂的，第一次完成十二纪，而览、论两部分则是后来补充的。另外，《吕氏春秋·安死》篇载：“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记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这段话中提到的几个国家，齐国是最后灭亡的，时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因此有学者推论：《吕氏春秋》的初稿完成之后，还经历过多次补充修改，直到秦统一天下之后才定稿。

在传世的先秦古书中，《吕氏春秋》是仅有的一部有明确编纂纪年的著作。《序意》篇开头就写道：“维秦八年，岁在涒（tūn）滩。”这就明确记载了《吕氏春秋》成书的时间。不过关于这句话的理解同样有分歧。涒滩是古代天文历算的术语，指太岁在申，

照历法推算，应是秦王政六年（前 241 年）。但是“秦八年”如果指秦王政八年（前 239 年），这两者之间就有两年的差距。因此有学者认为“秦八年”应该指秦灭周之后八年（即秦王政六年）；有学者认为一般的历法推算有误，差了两年，秦王政八年才是真正的太岁在申年；也有学者认为，秦国所用的颛顼历与夏历有一年的差别，加之吕不韦把秦王政的纪年从庄襄王去世嬴政即位当年算起，而不是循惯例把第二年算做元年，所以《序意》的“秦八年”是秦王政八年，实际指的就是通常说的秦王政六年；还有学者认为“秦八年”实际所指是秦王政七年。不管这句话怎么解释，都可以确定，《吕氏春秋》成书时间在公元前 241 年至前 239 年之间。

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除了受诸子百家著述流传的影响之外，还有更深层更现实的目的。《序意》中说：“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所以诲颛顼也。’”显然，文信侯吕不韦在这里是用黄帝与颛顼的关系来隐喻他与秦王政的关系，他要用这部书教育秦王政如何治国安邦。《吕氏春秋》的很多篇章，都有直接告诫君主应当怎样治理国家的内容，其中《勿躬》《用民》《达郁》《分职》等篇，更是切中秦王政的弊病，使人感到这是针对秦王政而发的议论。另一方面，吕不韦主政时期，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已较明朗，吕不韦招致宾客的目的之一就是“欲以并天下”。他主持编纂这本书，可能也含有总结治国之道、为统一天下提供思想武器的目的。

《吕氏春秋》编成之后，吕不韦把它“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当然，《吕氏春秋》并不是字字珠玑，连一个

字都没法“增损”；相反，《吕氏春秋》的文字错讹不少（当然许多是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内容重复甚至语言重复的现象更多。所谓“一字千金”的修改费，不过是借助相国的威势而进行的炒作罢了，目的当然就是为了扩大《吕氏春秋》的影响。事实证明，这次文化炒作跟他押宝异人的政治投机一样，也取得了商业化的巨大成功。

三、《吕氏春秋》的内容与思想

《吕氏春秋》全书分三部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各有五篇，共六十篇。八览各有八篇，共六十四篇。六论各六篇，共三十六篇。全书总计一百六十篇。加上《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一篇。现在流传下来的本子《有始览》遗失一篇，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全书只有一百六十篇。

《吕氏春秋》的编排很有条理，这一点在“纪”的部分有集中体现。纪分为十二部，用春夏秋冬四季各加孟仲季三月的组合月名作为纪名，如“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等。每一纪五篇，“以第一篇言天地之道，而以四篇言人事”。所谓“天地之道”实际上是指月令，记录这个月的物候、天象、施政活动、民事活动及相应的禁忌，它们是十二纪的主干，又称十二月纪。“纪”就是纲纪，既统率着自然时令，也是当时国家施政的根据。《吕氏春秋》用十二月纪作为主干，有强烈的为帝王建规立制的意思。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归属于春夏秋冬四季，“以春为喜气而言生，夏为乐气而言养，秋为怒气而言杀，冬为哀气而言死，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按照这样的思路，用四季统辖与节候有关的人事内容：

春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因此《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三部分包含了《本生》《贵生》等以养生为主要内容的篇章；夏季意味着壮大，音乐是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所以论音乐的《大乐》《音律》等篇章都收在《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中；秋风萧瑟，有一股肃杀之气，因此《孟秋纪》《仲秋纪》《季秋纪》中多为论用兵用刑的篇章，比如《荡兵》《决胜》等；冬天是收敛储藏的季节，也是一年的末尾，因此关于死亡的篇章如《节葬》《安死》等篇收在《孟冬纪》《仲冬纪》《季冬纪》中。

所谓“览”是观览的意思。第一篇《有始览》说：“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就明示了“八览”的宗旨。“八览”从开辟天地的“有始览”出发，按“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排列，主要探究国家祸福的由来，以历史为鉴，总结治国的经验和方法。如《孝行览》论孝行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治国的良方，以下七篇都围绕君子之行展开。《慎大览》论强国更要谨慎，其下各篇乃治国用兵方略。《审分览》论为君之道，下属七篇就阐述君王的统治手段。《审应览》说君主要慎重其辞，其下各篇都与察辨相关。

“六论”包括“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盖博言君臣氓庶之所当务者也”^①。例如《开春论》由春主生命阐述王者应该厚德积善、救死缓刑，以下五篇或论尚贤，或论养生，或论爱民，都与春之生有关。《慎行论》论君

^①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1933），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子小人的处世，以下五篇都是讲处世的原则和具体要求。《贵真论》论君王应该贵直，以下数篇就讲进谏、纳谏、拒谏的故事和道理。

可见“八览”“六论”同样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每览或每论包括若干篇，以第一篇的名称为某览某论的名称。“览”与“览”之间、“论”与“论”之间，以及同一览或同一论中的各篇之间，虽不如“十二纪”那样排列有序，也不如每“纪”各篇的内容紧密相关，但大致也是有某种联系的。当然，由于编撰者过于追求每一部分篇数的等同，所谓内容的关联其实并不那么自然，明显带有人为分合的痕迹。例如《士容论》论国士的操守仪态和知识修养，但其中的《务大》与《有始览》的《谕大》同，其余四篇则论农业为本，与“士容”关系不大。

《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为纲，“览”古“论”今，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主要的议题是关于怎样做好国君、怎样治理天下。有的论述为君治国的根本原则，比如《圜道》《君守》等篇；有的告诫君主应反躬自省、修养身心，比如《论人》《自知》等篇；有的告诫君主尊重贤才、求取贤才，如《当染》《下贤》等篇；有的主张治国以民为本，如《务本》《爱类》等篇；有的主张治国要以德治为主、赏罚为辅，如《当赏》《用民》《上德》等篇。这些论述从各个角度总结了为君治国的经验，可以看做一次成系统的政治思想的整理。

《本生》《贵生》《重己》《情欲》《尽数》等篇章论述了养生之道，主张养生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强调饮食、情绪与声色享乐都应该适中，不能过度，过度就会引起疾病；强调精气流通，如果贪图安逸享乐，

缺少运动，精气郁结，就是“招魔之机”。《吕氏春秋》保存的这些医学与卫生方面的资料，以及所主张的“法天顺时”“知本去害”“顺性贵生”“胜理归朴”等养生原则，对现代生活依然有启发意义。

论述音乐的篇章主要有：《大乐》讲音乐的起源；《侈乐》反对淫侈的音乐，主张“节乐”；《适音》论音乐的和谐；《古乐》记载传说时代的乐舞，可以视为上古音乐发展史；《音律》论述音律相生的原理，是乐律学的专论；《音初》记载诸音调的始创；《致乐》《明理》谈到了音乐与社会治乱的关系。这些篇章涉及音乐发展史、乐律的原理、欣赏音乐的原则、音乐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是研究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

论述战争与军事的共有八篇：《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这八篇讲的都是军事理论，对具体的战争技术并没有展开论述。其核心思想是“义兵”说，主张用义兵“诛暴君而振苦民”，反对主张停止一切战争的“偃兵”说；认为战争取胜的关键在于“三军一心”，主张重视士卒的选择与训练、兵器的选择与改进。这些论述是以战国时期战乱频仍却“无义战”的现实为背景的。

关于教育思想，《劝学》《尊师》《诬徒》《用众》四篇有集中的论述。它们推崇教育的功用，把学习看做实现耳目心智固有功能的必要途径，因此主张重视教育，尊敬教师；倡导“善教”“善学”，批评教育和学习过程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吕氏春秋》的这些篇章和《礼记·学记》等文献一样，是我们了解先秦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

《吕氏春秋》的最后四篇是关于农业的论述：《上农》论述重农思想与农业政策；《任地》谈如何使用土地；《辩土》论耕作要根据土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审时》论耕作要适应天时。这些篇章总结了上古农业生产经验，是现存最早关于农业生产知识的著作，非常珍贵。

以上介绍并不全面，《吕氏春秋》的内容远不止政治、军事、教育、农业、音乐、养生这几个方面，实际上还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外交、德行以及天文地理、时令气象、动植百物等各个领域，这里不再详述。

就《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而言，历来被视为“杂家”。不过，在很多学者眼里，杂家并不成为先秦诸子中独立的一家。因此，历代都有人试图找出《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究竟属何流派。东汉人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把它看做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著作。也有学者认为《吕氏春秋》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它“大抵以儒家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墨子、曾子言”。清代学者卢文弨认为《吕氏春秋》的核心思想是墨家学说，“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饰以儒术”。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吕氏春秋》主要摄取儒道两家的思想，“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上是因袭儒家”，而“在君道一层颇近于道家”。陈奇猷则认为阴阳家学说才是《吕氏春秋》全书的重点。

以上列举的远远不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论述，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种观点各有道理，这